外媒记者交往偶记

西班牙《侨声报》记者　潘　佼

华媒故事（15）●西班牙

身为一名海外华文媒体记者，我入职已经有8年时间，行走在世界各地，经历了林林总总的新闻事件。在形形色色的人群中，遇见最多的仍是同行——记者。

刚入行时，我还是一名在西班牙的中国留学生，常在学习之余，往来于新闻现场。作为新手的我充满好奇心，在采访时少不了和其他媒体记者搭话聊天。如果遇到华媒记者，还能分享他们不知从何处打探来的“小道消息”。一来二去，大家也都成了朋友。

西班牙几家华文媒体中，巴塞罗那华媒有记者十几名。大家彼此熟悉，一旦有采访通知，会相互转告结伴前往。平日里，大家也会出来聚聚餐、聊聊天；同在异国他乡，同为华媒成员，自然感觉亲近。可时间一长，总有人回国，有人转行。不过，“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有人离开，就定有“新鲜血液”来加入。

在国外工作，接触更多的则是地道的外媒记者。之所以用“地道”这个词，是因为海外华媒虽然在“娘家”祖籍国属于“外媒”范畴，但是在老外记者眼中，我们似乎仍是“来自遥远东方的消息传播者”。

曾有一名老外记者问我：“你是来自中国的记者吗？”“不是，我来自西班牙当地的媒体。”“那你们是用中文写作还是用西班牙语？”“当然是中文，因为读者大部分是生活在西班牙的中国移民。”“能给我留一个联系方式吗？我正在筹划一个关于西班牙媒体业态的专题报告，我想你们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他叫胡安，就职于西班牙《先锋报》。我和他在一次采访中结识，便有了上述对话。后来，他找到我做了一份问卷调查，主题是关于西班牙华文媒体的经营状况。看完问卷调查结果，他说：“你们在这里经营一份中文报纸，太艰难了。”

不久，胡安发邮件告诉我，他被报社派往外地，因此专题报告一事也一直未能落地。他说自己会继续做下去，完成报告，并对我表示感谢。

2010年4月21日，萨马兰奇去世。一时间，举行葬礼的地方——巴塞罗那大教堂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

海曼是一名自由摄影师，专门向各媒体机构有偿提供新闻图片。在举行吊唁仪式前的时间空隙，我们聊了几句。之后，由于我漏拍了某名人前来吊唁的特写，便向他索要了一张照片，完成了报道任务，也结识了这位朋友。

作为免费赠送照片的回报，我领着海曼在巴塞罗那的华人批发街走了一圈，并在征得店主同意的前提下，让他拍摄照片。他计划出版一本图册，专门讲述巴塞罗那各移民群体的生活。

“我的资料库里已经有来自印度、摩洛哥、中东地区等移民族群的图片。”海曼如数家珍地说起来，还侃侃而谈其间的区别。

“那来自中国的移民和其他移民群体有什么区别？”我问道。海曼坦言，自己对中国人了解并不多，因为语言上的障碍，和大部分中国人难以沟通。“即使去中国餐馆或者超市消费，也只是简简单单地说几句话，很难做深层次的交流。”海曼说，我算是他的第一个“中国朋友”。

2014年3月，我回国采访两会。到了“重头戏”——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大家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无数媒体期待着这份报告出炉，也做好了进行全方位深度解析的准备。

那天，我早早来到会场，发现旁边端坐着一位年轻的外媒女记者。我们聊了两句，得知她是西班牙某知名媒体的驻华记者，在中国已经工作了两年时间。和我一样，这也是她第一次采访两会。

“你对政府工作报告有什么看法？”她问我。

“相较往年，这次报告里强调的环境保护和民生议题的力度更大，相信这两个方面在今年会有所改善。”我答道。

会后，我们相互告别，却未留联系方式。第二天，我打开这家媒体的网站，阅读他们的两会采访报道。在对政府工作报告解析的文章中，有相当大的篇幅着眼于中国军费的增长。虽然我知晓一些外媒报道中国时的“一贯风格”，但回想起前一天我们愉快的聊天，倒让我感觉有些沮丧。如果不是没留她的联系方式，我还真想一问究竟。

回顾这8年的采访经历，无数新闻人物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而与媒体记者的交往也算是一种独特的回忆。身处异国，不同文化间的沟通有磕碰、有共融，但所有的点滴小事，都值得慢慢回忆，且行且珍惜。

题图：要了解、融入西班牙主流社会，华侨华人敞开怀抱、积极沟通是“尚方宝剑”。图为在西班牙举行的春节庆祝活动中，巴塞罗那当地居民与舞狮队成员在游行中互动。　**新华社**发

●希腊

16岁华人女孩的“希腊语课堂”

杨少波

微信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雅典华人社区，一个炙手可热的微信群——“希腊语教课群”已经“满员”；应学习者强烈要求而开设的“希腊语教课群2”，也迅速达到500人的极限。在两个微信群中，一个声音甜美的小女孩非常活跃，一字一句地教授人们希腊语。

中文和希腊语可谓东西方颇为繁难的两种语言。这个有着整整1000名学生的希腊语老师，发音纯正，教课完全免费。从微信号中，可以知道她姓罗。那么“小罗老师”到底是谁？带着诸多好奇，《中希时报》记者对她进行了采访。

16岁的罗羽琦出生在希腊，父母都是早年来希腊发展的中国人。“小罗”小时候，曾短暂到中国上过一学期的幼儿园，后来又回返希腊，现在希腊公立学校读高中。她的汉语是自学的，中文表达干净简洁、礼貌柔和，语言语法背后，是东方的谦逊与辞让。她喜爱唱歌，从中文歌中，打下了自己的语言基础。

“你的希腊语那么好，就开个微信群，教我们希腊语吧！”两个好朋友的一句玩笑和建议，便催生了这个“希腊语教课群”的萌芽。微信群建立后，罗羽琦也惊讶华侨华人学习希腊语的热情如此高。

“刚开始，我只是打算过了暑假就停用微信号，因为功课和家里餐馆的事太忙。”她说，看到大家那么认真地在学，也都有所进步，“就很开心，也很感动”。

罗羽琦的“录音棚”就在自家餐厅的楼上。从华人开店需要的各种商品的名字，到餐馆点餐时菜肴的名称，她都纳入了“教材”范围。

为了课程形象具体，她还从网上下载了图片，让身在异乡的华侨以生动轻松的方式学习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希腊用语。为此，罗羽琦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以前，我听说过中国同胞因为语言不通，在遇到紧急病痛时，无法对急救中心准确表达自己的情况，我也常常接到华侨华人从各种紧急场合打来的翻译求助电话。”罗羽琦说，华侨华人能够在希腊相遇，都不容易，“我很珍惜这样的缘分，如果我的工作能帮助到在希华人，我非常开心。”

“希腊语的确很美，但在我心中，最美的还是汉语。汉语在表达事物和情感时的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小罗老师说，在希腊接受系统教育的经历使自己对希腊文化非常熟悉，她非常喜爱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及希腊神话的故事，其中美神阿芙洛狄特和智慧女神雅典娜是她的最爱。

“希望微信群里那些年纪稍长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克服‘语言恐惧心理’，坚持把希腊语学好。”罗羽琦说，学好了希腊语，便能更好地了解希腊的文化。当记者希望她为自己的1000名粉丝写一句话时，她写道“活到老，学到老！”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语，是词汇丰富、语法复杂的一种语言，给在希腊生活的华侨华人增加了巨大的交流难度。希腊华社中的这件“微信小事”，也许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在希腊生活的华侨华人将从希腊语难关开始，沿着语言铺就的阶梯，和这片土地产生更为紧密的联系，一步步走进希腊主流社会，真正融入当地生活。

（摘自希腊《中希时报》）

●意大利

普拉托华人如何“治安逆袭”？

近日，意大利某华人协会在普拉托组织了一场提倡“和平文明共处”的行动。协会号召旅意华人共同抗议发生在华人团体内外的各类犯罪现象。在普拉托一家超市前，到处可见抗议队伍里“我爱普拉托”、“和平万岁”、“抗议犯罪行为”等标语。面对各种针对华人的拦路抢劫、盗窃、诈骗等犯罪活动，华人终于准备“逆袭”。

现场华人挥舞手中的旗帜，表达他们对普拉托的爱以及对和平与安全的向往。与此同时，大家也希望意大利社会能够接纳旅意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并对此持有宽容的态度。参与此次活动的有工人、学生、华人企业家等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200多位华人。

长期以来，华人极易成为当地犯罪分子和盗窃团伙的目标。许多华人平时爱穿名牌服饰、背名牌包，加上仍有不少华人喜欢携带现金，更使其成为打劫、偷盗等恶性事件的受害目标。对此，华人协会特别提醒当地华人，减少夜晚外出活动；不要随身携带大量现金；衣着行事不要太过高调。

前段时间，华人协会反对将员工宿舍搬到工厂附近的提议。协会发言人指出，“这是十几年前老旧的思维方式。如今，我们需要一种新思路，需要遵守当地社会已有的法律和法规。”据悉，不久前，该华人协会还组织了“清扫当地道路”的活动。对此，当地新闻媒体强调：“新一代的华人孩子在意大利长大，而对于没有在这里出生的华人群体而言，他们也希望能在真正意义上融入当地社会并与其和平相处。与此同时，华人群体还在不断思考及自我反思。”

华人协会发言人同时表示，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协会还将代表华人团体，向两个曾因华人的过失而失去亲人的意大利家庭致歉，目前正在号召大家集体去慰问这两个家庭。

（摘自《欧洲时报》）

图为普拉托华人抗议频发的针对华人的抢劫、偷盗等恶性事件，敦促政府加强治安管理。　**资料图片**

●日本

为中企发红包点赞

蒋　丰

2015年岁末，日本兵库县三田太阳能电站工程现场，一位中资电力企业负责人给所有在工程现场的建设人员都发放了一个“红包”，里面分别装有1万日元。

发“红包”！中资企业给日本企业员工发“红包”！常年旅日的我立即注意到，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新闻点。发“红包”的时候，企业负责人微笑着向每一位日本企业员工鞠躬致谢，预祝他们新年快乐。排着长长队伍领取“红包”的日本员工们，每一个人脸上也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中资企业新年在海外发“红包”，意义不同寻常。

首先，入乡随俗，展示了走向海外的中资企业对所在国风俗习惯的尊重。在日本，新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许多日本企业在发放年终奖以后，老板还会以个人的名义发“红包”。现在，中资企业给日本员工发“红包”，体现出一种对所在国风俗习惯的尊重。这种尊重，有利于企业的“本土化”，促进企业根植于所在国的长远发展。

其次，中资企业新年在海外发“红包”，缩短了中资企业、当地企业、员工之间的距离，提升了三方间的亲近感。中企走向海外时，都不同程度遇到了如何与当地企业以及员工交流、交往的问题。当地社会多少会有一种“戒备感”。在这种境况下，中资企业通过新年发“红包”的做法，营造出一种和谐的气氛，让“心路”畅通，才会让“财路”滚滚。

再次，塑造了中资企业的新形象。中资企业此举表明，跨海而来的“商船”是为促进中日民间友谊而来，为推动两国经济发展而来，为助推双方电力合作而来，为谋取相互间的双赢而来。这是中资企业走向海外时树立的一个新形象，而这种新形象的树立正需要“润物细无声”的温馨举动。

（摘自《日本新华侨报》）

中资企业向日本员工发“红包”。

●英国

代购从业者的酸甜苦辣

侯清源　孔　帆

近年来，随着海外商家的限制、假货和运输的问题、中国海关政策的调整，海外代购经历了“淘汰”和“转型”的阵痛。与此同时，跨境电商和快递行业正看准这个国际商机，给代购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欧洲时报》英国版记者日前采访了英、法两国一些代购从业者及相关人士，听其讲述代购之路的酸甜苦辣。

身在海外，许多华人或多或少都有“做过”或“被做过”代购的经历。每次回国，行李箱也都会塞满亲戚朋友委托捎带“低价、正品”的奢侈品或各种衣物及化妆品。

英国华人全职妈妈乐乐，是一位有5年多经验的“资深代购”，赴英前曾在法国上学的她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代购生涯。

“刚开始是偶然的机会，有中国朋友让帮忙在法国买奢侈品，我发现其中的利润空间还挺大，就当成自己的兴趣爱好做了起来。那时还在上学，就每周末出去逛街扫货。”她说。

毕业后，乐乐搬来英国定居、结婚、生子，代购变成了主业。她的个人微信成了主要交易平台，在朋友圈晒娃、晒货、晒生活。每天平均十几条朋友圈状态，除了推荐商品，她也会偶尔发一些奢侈品的小知识以及顾客商品打包邮寄的现场流程图，与客户们保持互动沟通、建立信任。

乐乐的微信通讯录里有2000多位好友，很多都是朋友介绍、口碑营销来的客户，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国一二线城市的职业女性。“不少客人都是回头客，因为信任也就一直保持联系。我微信上的聊天记录基本都不会删，保存客户的一些基本信息、爱好，然后根据兴趣偏好风格推荐。”乐乐说。

与全职代购相比，留学生代购族由于时间原因，交易规模较小，但群体却相当庞大。

在法国做代购的安妮表示，法国很多留学生代购都是居住在巴黎的“80后”、“90后”，她们本身就热衷购物，熟悉各种品牌。与餐馆打工比起来，代购太轻松了。

在巴黎学习奢侈品管理专业的李超，把代购作为职业道路的尝试。他主要代购一线品牌的新款、经典款以及奢侈品潮牌，今后他想留在巴黎做一名专业的奢侈品买手。现阶段，他主要的时间花在学习语言上，空闲时间在做代购。对于长期从他这里采购的顾客，他可以帮着搭衣服、选配饰。

然而，抛开表面的光鲜和丰厚的收入，代购的生活也有难言的辛酸。海外商家的市场限制、跨境电商海外直邮的兴起、假货和运输的问题、中国海关政策的调整，任何一个因素都会给海外代购造成打击。

对于留学生“代购党”而言，即使没有市场因素影响，“被代购”也造成了对学业的影响。此外，有的从业者都不想回去过年了，“一是机票贵，二是每次回去都要帮忙带一堆东西。”

除了人情上难以拒绝，做代购可能要面临的种种风险也令“被迫”成为代购的留学生绷紧了神经。留学生代购不仅十分辛苦，还可能会面临很多难以避免的尴尬，比如所购商品的限量和价格波动、政策限制以及自身的困难等。（摘自《欧洲时报》英国版）

等待包装发货的代购商品。